

# 信息疫情的病毒式传播:表征、研究现状与展望

钟智锦 周金全

**摘要:**信息疫情是传染病流行期间爆发的一种大规模信息流行病,主要表现为与疫情有关的谣言、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在网络媒体中的盛行。信息疫情的传播在内容、过程、效果方面均具有病毒性的特征。当前国内外传播学领域对信息疫情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信息疫情的分布、病因推断与治理三类。未来的研究需采用科学的因果判定方法、细分易感人群、经验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深入开展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对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既要兼顾组织、社会与国家层次的影响,关注在线传播与人际交流之间的效果差异,也要深入探究影响产生的机制。在信息疫情治理方面,加强监测预警、精准辟谣与效果评估。最后,也应聚焦全球化信息生态,从国家传播视角研究信息疫情的成因、表现、影响及其治理。

**关键词:**信息疫情;虚假信息;病毒式传播;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4-004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157)

##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染病。202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报告中特别强调:除新冠病毒外,全球还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massive infodemic),表现为不实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及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混杂在一起,污染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环境,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信息疫情”或“信息流行病”<sup>[1]</sup>。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引发信息疫情的首个传染病,在过去的几次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期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信息疫情的发生。2003年SARS疫情期间,美国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维·罗特科普夫针对流言在全球互联网肆虐的现象,就提出“信息流行病”的概念,他认为,一些关于传染病的事实信息混入了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和传播,影响公共卫生的同时,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问题,信息流行病的“传染”远大于SARS本身<sup>[2]</sup>。这种现象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非典疫情初期传言禽流感、鼠疫来袭,板蓝根、白醋可以防治病毒等谣言的盛行。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国家爆发时,一群暴徒声称病毒是利比亚政府为了从人民手中榨取钱财而制造的骗局,并袭击了利比亚首都的一个病毒诊所和隔离中心<sup>[3]</sup>。在非洲西部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埃博拉病毒的传言,认为它是美国制造的、用来控制非洲的生物武器<sup>[4]</sup>。塞卡病毒的肆虐也滋生了类似的信息疫情,如认为咖啡可以用作驱蚊剂来预防病毒感染<sup>[5]</sup>、塞卡疫苗的开发是削减一半全球人口计划的一部分<sup>[6]</sup>等。也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关于塞卡病毒最流行的10条新闻中有一半是假新闻,且假新闻被分享的概率是真新闻的三倍<sup>[7]</sup>。艾滋病疫情流行的早期,有很多虚假信息主张病毒并不存在、也不会诱发艾滋病,且它的治疗

方法对人体健康有害,这种错误观点甚至影响了政府决策。南非的姆贝基政府在 21 世纪初否认艾滋病并拒绝有效药的投入,反而鼓励患者采取食用大蒜、甜菜根和柠檬汁等未经证实的疗法,令很多患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sup>[8]</sup>,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有综述研究发现,自 2000 年以来,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在预防、治疗、风险因素、传播方式、并发症和疫苗等各方面广泛存在着错误信息,其中,涉及疫苗和政府等议题的阴谋论也十分盛行<sup>[9]</sup>。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样有大量虚假信息在网络中蔓延,由此引发的信息疫情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关注。相比而言,西方学界对信息疫情的理解仍聚焦在虚假信息的大规模流行,而我国学者则将虚假信息引发的焦虑、恐慌等社会情绪的蔓延也视为一种信息疫情现象。本研究认为,疫情期间的虚假信息流行之所以被称之为“信息疫情”,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在内容、传播过程和效果方面的病毒性特征。当前的研究分别围绕信息疫情“怎样分布”“为何产生”“如何防治”三个问题展开,本文在对这些研究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强调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导致信息疫情的因素”“信息疫情的社会影响”“信息疫情的治理”和“信息疫情的跨国比较研究”几个议题。

## 二、信息疫情的病毒性特征

笔者认为,疫情期间谣言、虚假信息、不实信息的大规模扩散之所以被称之为“信息疫情”,本质上在于虚假信息传播的病毒性特质。信息疫情的病毒性体现为信息内容中蕴藏的负面情绪、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模式以及信息传播对个体和公众带来的有害影响。

### (一) 信息疫情的内容特征

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比较信息疫情与疫情期间其他信息之间的内容差异,而是分析信息疫情相较于一般虚假消息的内容特征。首先,信息疫情的内容除了包括与流行病相关的不实信息、虚假信息、谣言之外,它的病毒性体现在信息中传递或试图唤起的负面情绪。情绪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具有铺垫、唤醒、认知和交流等多重功能,心理和生理层面的情绪调动、共鸣和感染往往是带动信息载体在人群中传播的内生动力<sup>[10]</sup>。换言之,疫情相关的虚假或谣言信息试图煽动民众的恐慌、焦虑、不满、怨愤、歧视、敌对、甚至仇恨等负面情绪,通过放大某种潜在或显性的社会情绪吸引人们关注。在诸多复杂情绪中,恐慌和焦虑是贯穿各阶段信息疫情的主流情绪。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是信息疫情的流行期,针对政府部门、医疗卫生组织等机构的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尚无经验、信息相对匮乏时期,利用民众对当地有关部门的迫切期望,有意编造一些极端事件,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引起社会恐慌。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时期,社会对病毒防治措施基本达成共识,与病理学相关的伪科学谣言有所降低,此消彼长的是围绕地方疫情发展实况与防疫措施的谣言,此类信息疫情常利用人们对高接近性风险的高防范意识,诱发居民的恐慌和紧张感,使信息疫情在当地人际网络迅速扩散。与现实情况对应,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尤其关注“信息疫情”中所包含的焦虑、恐慌等公众情绪。也有学者指出,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恐慌情绪,因而转发扩散海量无用的、虚假的疫情信息,“信息疫情”由此产生<sup>[11]</sup>。王斌同样认为,“信息疫情”不仅是关于传染病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更牵涉到不良情绪的规模化传染,并将这些情绪划分为对疫情不确定性的惊恐、对被道德化事件的怨怼、对苦难化叙事的同情疲劳、对误解信息的调侃戏谑四种情绪<sup>[12]</sup>。

其次,国际领域的信息疫情则带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在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封城等措施全力控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有国外媒体借此抨击中国制度、煽动国家歧视,一些带有政治阴谋论的信息疫情在西方社会成为操控民意的舆论工具。以美国为例,名为“匿名者 Q”的组织声称新冠病毒是为了阻挠特朗普连任而制造出的病毒、政府通过推广疫苗向民众体内植入“微型芯片”以监测行动轨迹等阴谋论广为流传,这些信息不仅成为阻碍防疫措施有效落实的缘由,也加剧了美国的党派对抗和社

会撕裂。

### (二) 病毒式的传播过程

在信息扩散网络研究中,病毒式传播是区别于广播式传播的一种信息扩散网络结构,相比而言,广播式指的是一种“一对多”的信息扩散模式,病毒式则描述了如同传染病在人与人之间快速蔓延一样的链式传播过程<sup>[13]</sup>。就信息的传播过程来看,引发信息疫情的虚假信息常呈现出“病毒式”的扩散模式,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网促进了信息转发网络的产生,使得信息的传播呈几何级数增长<sup>[14]</sup>。近年来,涌现了一些将大规模用户信息行为数据同计算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这些研究量化了社交媒体中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扩散效果差异。2018年,一篇发表在 *Science* 上的论文基于2006年到2017年期间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发现虚假信息比真实信息扩散得更远、更广、更深入,也更快速<sup>[15]</sup>,而且相比于一对多的广播式结构,虚假信息更接近一对一的结构病毒式的传播模式。2021年发表在 *PNAS* 上的论文采用同一批研究数据发现,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的传播模式差异主要是因为虚假信息触及的用户更多<sup>[16]</sup>。有研究者采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发现,接触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假新闻就像被病毒感染一样,会降低人们的信息识别能力,使他们越来越容易受到“感染”、倾向于相信并扩散这些假新闻,该研究还发现,社交网络中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超级用户就如同病毒的超级传播者,他们可以促进假新闻的快速扩散<sup>[17]</sup>。在疫情期间,当公众参与到虚假信息的转发分享行为当中,病毒式扩散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同时也伴随着焦虑、恐慌、谴责、怨愤等社会情绪的大规模蔓延,这也是信息疫情与普通虚假信息相比的特殊之处。

鉴于信息疫情中的虚假信息在网络中的“病毒式”传播特征,流行病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对虚假信息扩散过程的解释研究中,常见的有SI(易感-感染)、SIR(易感-感染-免疫)、SEIS(易感-接触-感染-易感)等数学模型<sup>[18-20]</sup>,它们分别描述了社交网络中个体参与虚假信息转发时的不同状态过程。同解释传染病扩散机制一样,这些模型解释虚假信息传播的关键也在于再生数( $R_0$ , reproduction number)的取值,即一个感染者产生新病例的平均数量,它可以用来评估感染源的传染性<sup>[21]</sup>。在虚假信息传播中,它表示接触到某个用户发布的虚假信息后,继而转发该信息的人数。对于信息本身的扩散效果而言,当再生数大于1时,虚假信息会呈现指数增长,最终形成大流行的传播效果,当再生数小于1时,虚假信息会趋向销声匿迹。通过测量参与同一虚假信息传播者的再生数,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出助推虚假信息扩散的超级传播者,发现各类用户在虚假信息扩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差异,也为信息疫情的监测预警工作提供了可观测的科学指标。

除了上述关于信息本身的病毒式传播特征外,也有研究注意到了信息所处的媒介和社会环境如何推动信息疫情的快速扩散和裂变。如有研究指出,当信息疫情恰好与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相耦合时,更容易带来快速扩散效应和羊群效应<sup>[22]</sup>。有研究从媒介化风险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信息疫情的病毒式传播过程,正是借力于网络空间的媒介特征,突破物理时空限制的信息病毒比生物病毒的扩散更具人群随机性,且随着疫情事件发展以及“众包式”的信息加工再生产,信息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又会像病毒扩散般变异和迭代,由此呈现出病毒化的扩散模式,风险期间公众的负面情绪则是助推信息疫情病毒化扩散的场景势能<sup>[23]</sup>。

### (三) 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近期有学者对“虚假健康信息”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虚假的健康信息并非单纯指信息内容的不准确或者失实,关键在于这种信息在人们解决实际问题 and 做出决策过程中提供了错误的指引<sup>[24]</sup>。人们为何会相信不实信息?可以从认知偏差层面来解释。首先,个体通常对自身的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比较自信,当接触到虚假信息时,人们倾向于结合自己的先前经验和虚假信息做出决策,而虚假信息常常会有某些细节或情绪是迎合人们的日常经验的。其次,相比于反复推敲,人们总是习惯采

取信息加工成本更低廉的初级直觉来思考问题,由此降低了对不实信息的鉴别力<sup>[25]</sup>。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对风险的焦虑恐慌,都会驱使人们快速地相信虚假信息<sup>[26]</sup>。因此笔者认为,从传播效果层面来看,认知偏差效果是信息疫情对公众带来病毒性危害的直接表现,这种偏差又同人们的观点、态度和行为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经验研究发现,接触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让人们误认为自己具备了可以应对风险的相应知识,进而带来了信息回避行为<sup>[27]</sup>。接触和轻信虚假信息也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防护行为,如有研究发现,人们越是相信“服用双黄连、喝酒和吸烟可以起到预防病毒”的谣言信息,越不容易采取戴口罩等防护行为<sup>[28]</sup>。同时在美国和英国进行的随机控制实验研究也表明,接触关于新冠疫苗的虚假信息会降低人们的疫苗接种意愿<sup>[29]</sup>。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饮酒可以治愈或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谣言在伊朗境内盛行,这导致数百人因酒精中毒死亡<sup>[30]</sup>。还有研究发现,相信信息疫情中的阴谋论与暴力行为倾向之间密切相关<sup>[31]</sup>。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疫情的社会影响也是一个从微观到整体的病毒式扩散过程。个体层面,它主要作用于个体的认知、态度和情绪,会对个体心理和精神层面带来危害,更严重的会导致拒绝配合防疫安排、抢购囤货、诋毁疫区人群或感染患者等行为。随着这种个体影响的累积,它会通过集体认知转化为一种意见趋于一致的公共舆论,甚至发展出一定规模的集体行动,进而演变为牵涉疫情防治期间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整体性问题。

### 三、信息疫情的研究进展

学术界对信息疫情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信息疫情的分布、病因、以及预防和控制<sup>[32]</sup>。

#### (一)信息疫情的分布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疫情分布现状的研究大致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质”和“量”的维度分析虚假信息的主题及其数量分布;二是从时空维度揭示信息疫情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分布差异。既往研究或选择其中一个面向展开详细刻画,或综合其中几个维度全面分析信息疫情的分布特征。

针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信息流行病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这些虚假或谣言信息的主题进行了划分。如,根据国家互联网辟谣平台和执法机关通报处罚案例的数据,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呈现出地方性(地方疫情)、政策性(防疫政策)和民生性(个人防疫)的内容倾向<sup>[33]</sup>。也有学者参考非典谣言的分类标准,将新冠谣言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引发公众焦虑的恐惧谣言,主要涉及感染病例情况、防疫安排和疫情引发的粮食紧俏等问题。二是攻击性谣言,指的是那些凭空捏造的、针对个人、群体或地区的攻击性或歧视言论。三是病理学谣言,这类谣言围绕疾病的原因、病毒传播方式、防治手段展开。最后是延伸性谣言,主要牵涉到疾病防控对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影响<sup>[34]</sup>。还有研究将疫情前期较为流行的谣言分为伪科学的、与病毒和疫情来源有关的、有意渲染和夸大疫情惨状的、攻击中国制度的,以及国别谣言五种类型<sup>[35]</sup>。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分类标准,从多角度呈现了信息疫情的基本内容属性,但受到信息本身涉及主题混杂性的影响,不同类别的信息疫情之间难以保证绝对的互斥性。

也有大量研究计算了信息疫情的数量占比情况,如一项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2020年2月6日)的研究发现,谷歌中提供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不符合健康信息的质量标准的,也不是完全准确可靠的<sup>[36]</sup>。在表达形式和传播平台方面,一项基于国内语境的研究收集了2020年1月20日至4月8日“新浪微博辟谣”官方微博上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网络谣言数据,分析发现过半的谣言(63.9%)以文本形式呈现,微信是最常见的(71.3%)谣言最初发布平台,且从时间维度看,在不同时间段内,谣言的形式和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在空间分布上,湖北省是全国谣言信息的重灾

区,而辟谣信息主要来自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sup>[37]</sup>。从信息扩散的动态分布视角出发,匡文波和武晓立研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型及特征,将谣言传播模式分为了生成期、扩散期和消解期三个阶段<sup>[38]</sup>。姚艾昕等则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主体分布特征与时序变化,发现医疗卫生类谣言占比最高,谣言内容和不同时间段的疫情状况、舆论热点、政府回应事件等有强相关性<sup>[39]</sup>。

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当前中西方学术界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疫情分布展开了大量的描述性研究,也普遍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特定时间段内、特定媒体平台中信息疫情的话题分布进行了精细的刻画。但就国内学者强调的信息疫情涉及的负面情绪而言,却少有研究关注情绪的分布和演化过程。同时,受限于单一平台、短时间段的片面信息,我们仍然无法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疫情的全貌,也缺少对不同地区和国家信息疫情的比较研究。

## (二) 信息疫情的诱因

在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中,病因指的是那些使人群发病率增加的因素<sup>[40]</sup>,经典的病因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将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疾病发生的原因<sup>[41]</sup>,正常情况下三者保持动态平衡,一旦其中某个因素发生变化,平衡被破坏,人体就可能表现出病变。回顾以往探究疫情期间虚假信息为何流行的研究,同样可以将信息疫情的诱因归纳为以上三个维度的要素。

致病因子是引起疾病、决定疾病特异性的因素,对信息流行病来说,个体对虚假信息的接触是接纳、转发和扩散这些信息的必要条件,致病因子也可以理解为虚假信息本身具备的、可以促成信息流行的传播要素。其中,如上文所述,从内容特征来看,信息内容的情绪化和政治化色彩是导致其大规模流行的重要因素。此外,在信源层面,虚假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的影响力也是导致信息疫情暴发的原因。一方面,专业医疗卫生人士有关病毒起源、传播方式、防治疗法等方面的言论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靠得住的,即便这些信息有可能并不正确。另一方面,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传播者也可能是使虚假信息大规模扩散的助力者。如2020年,在一次美国抗疫前线医生峰会上,医生伊曼努尔公开宣称戴口罩对抵抗疫情毫无作用,而服用羟氯喹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抗疫神药早已经被辟谣,但总统特朗普在看到这则视频后,立即公开表达了支持观点,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争议,这则视频也被《纽约时报》评为疫情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列。再如Evanega等人发现2020年1月至5月期间,英文媒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所有虚假新闻中,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闻占比最高(37.9%),他们认为美国的总统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流行病”的最大驱动因素<sup>[42]</sup>。在我国,由专业人士参与散播虚假疫情信息的情况比较罕见,却不乏一些虚假信息借助权威人士之口编造出所谓的“专家建议”。

传染病发生过程中只有治病因子的作用未必一定会导致感染,虚假疫情信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受众所带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宿主即受众方面,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他们是否是信息流行病的易感人群。在“理性人”的假设下,人们是否相信并转发虚假信息取决于对谣言信息的判断力高低,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个体的谣言判断力又同性别、学历、收入水平等因素有一定相关性<sup>[43]</sup>。在国内疫情初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相比于年轻人和学历较高的人群,年长者和低学历人群更容易相信疫情谣言<sup>[44]</sup>,中老年群体也更愿意在亲友间分享一些关于疫情防护等方面的错误信息<sup>[45]</sup>。然而,人们选择相信或转发虚假信息又并非是绝对理性的,也可能是出于直觉的、基于已有态度立场的感性行为。如,疏忽解释(Inattention Account)理论认为,面临社交媒体中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个体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在信息分享前忽视了对信息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判断<sup>[46]</sup>。动机推理理论则认为,人们在面临新的(即便是虚假的)信息时,会根据预先存在的目标开始推理。换言之,在动机推理机制下,信息是为了人们已有的政治、种族或是宗教等方面的价值立场服务的,

信息内容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关注个体价值观念的信息疫情研究。如针对西方社会的研究<sup>[47]</sup>发现,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倾向于社会主导立场的人更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的虚假信息,而那些社会主导立场倾向较强、传统主义立场较弱的人虽然不愿意传播与疫情严重程度相关的虚假信息,但他们更可能扩散一些主张阴谋论和强调文化冲突的虚假信息。除了固有的价值观念外,在心理感知层面,对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信息过载的感知<sup>[48]</sup>、焦虑感<sup>[49]</sup>、从众心理<sup>[50]</sup>都可以有效预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实信息的分享行为。

最后,影响信息流行病蔓延的环境要素可以分为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领域。媒介环境是信息流行病得以传播扩散的载体和场域,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低门槛的内容生产机制使平台中的信息质量无法得到完全保证,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中交织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多种信息传播模式,使得信息更容易呈现病毒式扩散模式。在过去的十余年间,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在扩散反疫苗的虚假信息和伪科学信息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可见一斑。有经验研究发现,与新闻媒体相比, Twitter 上传播了更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错误信息。就更加宏观的媒介外部的社会环境而言,有研究发现,越是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信息流行病的蔓延越严重<sup>[51]</sup>。也有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程度与政治自由共同促进了假新闻的流行度,经济自由和媒体自由则可以遏制假新闻的传播势头<sup>[52]</sup>。

关于信息疫情诱因的研究吸引了传播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但此类研究仍然体现出“维度单一、动因有限”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大部分研究仅能聚焦导致信息疫情盛行的个别维度的个别要素,还鲜有研究可以综合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量,对导致信息疫情的诱因进行综合探究。诚然,对诱因研究提出囊括所有可能因素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但尽可能多地考虑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更符合社会现实的,也可以比较不同层面的诱因对信息疫情传播作用力的强弱。

### (三) 信息疫情的治理

信息疫情的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协同的过程,国内外学者的对策和经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第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与跨国治理行动。网络是信息疫情最常见的发源地和传播场域,政府完善立法、强化网络监管是从源头控制信息疫情产生的有效手段,如国内学者提出的“硬性把关”和“强化过滤”的治理策略<sup>[53]</sup>,从供给侧体系建设、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网络社区治理多方面建构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谣言治理体系<sup>[27]</sup>。此外,也有学者<sup>[54]</sup>呼吁,防止信息疫情的蔓延,需要建立地方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整合线下和线上资源,使权威信息在不同平台上流通,而这一策略目标的实现又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具体而言,监管部门需要出台相应政策对虚假信息的生产者给予严厉的惩罚措施。政府可以促成科技公司与专业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可以识别社交媒体中造谣者的技术系统。

第二,以媒体为行动者的自净行动。面对信息疫情,传统主流媒体应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协助平台信息审核、积极主动辟谣,同时也要创新信息传播形式,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使准确信息触及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平台媒体则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控制谣言信息传播、提升用户对信息真伪的辨识力<sup>[55]</sup>。也可以开通专门的辟谣平台、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的方式阻止谣言信息的扩散和影响<sup>[56]</sup>。平台媒体治理信息疫情的技术路径主要包括信息识别和传播控制两个方面,此类研究大多来自计算机学科。在信息识别技术中,有研究提出了基于“传播主体”“信息主题”“情感动机”三个维度指标的虚假信息识别算法,并根据信息在不同指标上的风险性高低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sup>[57]</sup>。也有研究指出,在社交媒体中,一些用户会采

用和健康医疗机构及官方建议相似的表述对虚假信息进行回复,通过对这些回复信息的识别可以较为高效地判定虚假信息<sup>[58]</sup>,同时,如果用户发布了关于虚假信息的核实帖,那么虚假信息也很可能存在于他的个人社交网络中,由此,可以建立协作系统,利用用户自愿贡献的核实帖来消除社交网络中的虚假疫情信息。还有实验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事先并没有考虑过信息的准确性,而对信息进行简单的准确性提示就可以大大提升人们在分享信息时辨别真相的水平<sup>[59]</sup>。对信息疫情的传播控制技术又可以分为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两种:从源头遏制的技术包括采用区块链技术追踪虚假信息发布源,或开发算法评估信源可信性,并降低那些低可信度信源在算法推荐中的优先级<sup>[60]</sup>。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识别网络中关键节点用户的方法,阻断他们接触虚假信息、促使他们保持对真相的认知,以达到扩散效果最小化的目的。

第三,以公众为对象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缺失一方面表现为信息辨别能力有限、反思批判意识薄弱,容易陷入对虚假信息的盲目信任。另一方面,风险事件期间公众恐慌、焦虑等情绪激荡,在网络媒体中的情绪化表达也容易助推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水平在治理信息疫情方面的意义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当前,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学术界对信息疫情防治的研究大多还局限在对策建议层面。在可操作性行动方面,关于信息疫情监测和预警的综合指标体系仍待构建和完善。由于信息疫情种类和其引发社会情绪的复杂异变性,媒体和平台方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手段也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而以公众为对象的媒介素养教育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为了达到短期内的教育效果,研究则可以从科学传播的视角,关注如何普及新冠肺炎疫情病理学相关的基本知识以及防疫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流程,尽量减少一些反常识性虚假信息传播的可能性。

#### 四、信息疫情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 (一) 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

虽然海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采用不同研究范式对信息疫情的“病因”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在传播学领域,有关信息疫情的经验研究有限、研究方法单一、缺少多因素分析和跨人群与跨地域研究等问题,就此,未来研究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采用科学的因果判定方法探知导致信息疫情的关键因素。在后疫情时代,信息疫情发迹于传染病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盛行于传播主体多元的网络环境、作用于多重情绪交织的受众群体,关于导致信息疫情流行的动因分析也需要纳入多维因素考量。如何在疫情发展的初期,锚定到那些最容易滋生信息疫情的议题、识别出煽动信息疫情扩散的网络推手、厘清助推信息疫情传播的社会情绪与公众心理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除了采用追踪调查、随机控制实验、引入工具变量、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对影响信息疫情的网络流行度、公众信任度的要素进行因果判定外,还需要将研究视角从聚焦于微观个体层面,拓展到组织、群体、地区与国家等层面的多重因素,探讨个体特质、群体规范、地域文化、社会环境、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等要素如何作用于信息疫情的发展。

第二,针对信息疫情的易感人群进行受众细分的归因研究。正如传染病病毒对不同身体机能的易感人群的发病机制不同一样,各类受众群体对信息疫情的信任和分享动机也存在差异,但与传染病发病的生理机制不同的是,信息疫情的“发病”往往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机制。年轻人与中老年群体、疫区与非疫区人群、城市与乡村居民等群体接触信息疫情后的心理感观也会存在差异,这也是决定人们是否相信和分享此类信息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对信息疫情的易感人群进行差异化划分、发现导致不同群体内信息疫情流行的个性化因素和导致信息疫情跨圈层传播的共通心理,都是未来

研究需要细致探讨的议题。此外,在高度发达的网络媒介环境中,如何辨析信息疫情在不同平台用户群体中的传播动力也值得关注。

第三,经验发现与质性分析相结合,洞察显性“病因”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信息疫情的爆发并非偶然,传播学领域的经验研究从信息特质、传播环境、受众心理等方面探究此类虚假信息何以盛行的同时,也应结合信息疫情植根的社会土壤,深入剖析它暴露出的网络治理、法制规范、公民素质、社会心态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受众面临疫情的恐慌感和焦虑感是否折射出社会信任面临的某种危机?信息疫情在网络平台中的扩散暴露出法制规范的哪些缺口?

### (二) 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

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媒介效果研究,作为一种与风险伴生的传播现象,它的影响是多维度、多面向的。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就信息疫情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心理情绪和防疫行为层面的微观影响的关注较为密切,但对中观和宏观层面社会影响关照不够、对影响机理的探究有限,以下研究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

第一,信息疫情对个体与社会带来影响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就个体层面而言,信息疫情的传播效果是否经历了由认知偏误到观点形成、再到行为实践的逻辑链条?这一过程中与个体信息处理(如处理模式、处理策略等)、态度观念(如自我效能感、社会信任、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观念)等因素之间存在何种交互作用关系?在社会领域,信息疫情带来的个体观点如何聚集成公共意见、个体心理如何演变为社会心态、这些意见和心态又在何种条件下会促成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

第二,信息疫情对组织机构、国家社会稳定有何种影响?如,信息疫情是否损害了专业媒体在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是否干预了政府防疫决策的制定和落实?是否阻碍了医疗卫生组织的预防和救治工作?对疫情期间的舆情疏导与国家治理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第三,信息疫情的在线传播与人际传播效果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与差异?信息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传播共性表现为由在线媒体平台向线下人际交流领域渗透的过程,线上讨论与人际交流的传播效果又有着哪些共性和差异?在两种扩散效应下又会产生怎样的集体行动效应?以上问题均需要系列经验研究提供科学证据。

### (三) 信息疫情的治理研究

信息疫情的治理是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外传播学领域关于信息疫情防治的研究仍以策略建议性论述为主,应用型研究有限。信息疫情的防治是一个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过程,它需要政府、媒体、医疗卫生机构、民众等多方合力开展,关于信息疫情的指导性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统筹和协调各方行动的作用。同时,信息疫情涉及的信息种类也是多样的,它表现为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恶意信息、欠妥信息此起彼伏的信息现象。这几类信息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虚假信息通常指的是违背科学和社会事实的假消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关涉疫情的防控药物、措施和政策安排等,也包含各地疫情动态等反事实类假消息,此类信息可能是传播者有意编造的,也可能是由于误解或证据缺失等因素带来的非故意性失实。恶意信息则强调了虚假信息中故意性失实的部分,此类信息的生产者有意编造疫情相关的不实消息,以服务于自身或所属利益群体的特殊目的。在西方社会,这种恶意信息常表现为针对党派或政治人物的阴谋论,在我国则更多表现为对疫区或患者的群体歧视、对境外归国人群的诋毁与攻击、以及对部分官员或公共卫生组织机构的抹黑言论等。换言之,西方社会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恶意信息多受政治意图驱动,而我国境内此类信息多用来煽动社会情绪,以制造社会群体的隔阂和撕裂。最后,欠妥信息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情景下信息传播的恰当性问题,即便此类信息并不构成失实,但在某种特殊社会状况下,一些信息的传播是有失妥当的,它可能会对稳定民众情绪、舒缓社会心态、构建社会信任起到反作用。具

体到实践应用层面,对以上几类信息疫情的综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信息疫情的监测与预警。对涉疫信息的监测,有助于预判信息疫情的苗头、从萌芽期遏制信息疫情的发展和扩散。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疫情,建立明确的识别和评价指标体系让监测预警有据可循。在监测对象选择上要兼顾到微博、微信、网络论坛、贴吧、短视频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多维数据,打破“数据孤岛”的局限,又要关注到 Twitter、Facebook 等国际化媒体中涉华疫情信息的动向。在方法上充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多主体仿真建模等计算方法,保证监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第二,信息疫情的精准辟谣。精准辟谣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是根据谣言内容发现公众关心的信息诉求,在辟谣信息中做出明确的澄清和更正。其次是针对谣言流行的特定群体,定制符合目标群体解码模式的话语策略,以达到因地制宜的辟谣效果。此外,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是一个关键的信息扩散节点,可以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促进辟谣信息在群体内的渗透。最后,平台媒体在辟谣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用户谣言信息的浏览记录,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可以实现对谣言的“精准打击”。

第三,信息疫情治理的效果评估。对信息疫情的治理不应止步于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对应对措施的效果评估也至关重要,阶段性的效果评估作为一种及时反馈可以对治理策略和手段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 (四) 信息疫情的跨国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染病所引发的信息疫情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普遍现象。但在不同制度、文化、经济、媒介生态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信息疫情又会存在显著差异。以新冠肺炎期间的信息疫情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信息疫情呈现出独特的政治化色彩,尤其在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反复强调“武汉病毒”等阴谋论实质是民粹政党制造民众排外情绪、拉选票的话语工具,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也是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体现。我国和西方社会语境下信息疫情的性质、成因、后果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化特征,信息疫情也可能成为影响国际舆论场中国家形象的负面因素。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对信息疫情的研究也可以围绕成因、影响和治理三个议题展开。

第一,上文提及的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仍属于针对中国问题的本土化研究范畴,而国际比较视角下的成因分析则可以通过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信息疫情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里的表征差异,分析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媒介文化、社会心态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力度。

第二,当信息疫情发展为全球化的媒介风险时,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信息疫情研究一方面应该关注它对世界信息秩序带来的挑战、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洞察信息疫情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中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三,信息疫情治理的跨国经验总结。即便信息疫情在我国与西方社会的传播存在一定差异,但它在利用群体不安心理、煽动负面情绪、借助网络扩散等方面仍然具有共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学术界从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对信息疫情防治展开了全面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西方社会也从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规制、应用算法技术、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未来可以就信息疫情的治理进行全球经验总结,为构建公共卫生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13; WHO, 2020.

- [ 2 ] D. J. Rothkopf. When the Buzz Bites Back. *The Washington Post*, 2003-05-11. [ 2023-06-03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2003/05/11/when-the-buzz-bites-back/bc8cd84f-cab6-4648-bf58-0277261af6cd/>.
- [ 3 ] D. Patta. Liberia Clinic Attack Overwhelms Overworked Ebola aid Workers. *CBS News*, 2014-08-17. [ 2023-06-03 ] <http://www.cbsnews.com/news/liberia-clinic-attack-overwhelms-overworked-ebola-aid-workers/>
- [ 4 ] A. Feuer. The Ebola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4-10-18. [ 2023-06-03 ] <http://www.nytimes.com/2014/10/19/sunday-review/the-ebola-conspiracy-theories.html>.
- [ 5 ] A. Ghenai, Y. Mejova. Catching Zika Fever: Application of Crowdsourc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for Track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Twitter. *arXiv preprint arXiv:1707.03778*, 2017.
- [ 6 ] M. J. Wood. Propagating and Debunking Conspiracy Theorie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5—2016 Zika Virus Outbreak.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8, 21(8):485-490.
- [ 7 ] S. Sommariva, C. Vamos, A. Mantzaris, et al. Spreading the (Fake) News: Exploring Health Messages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Using a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2018, 49(4):246-255.
- [ 8 ] C. Bateman. Paying the Price for AIDS Denialism. *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2007, 97(10):912.
- [ 9 ] N. Chowdhury, A. Khalid, T. C. Turin. Understanding Misinformation Infodemic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Due to Large-scale Disease Outbreaks: A Rapid Review. *Z Gesundh Wiss*, 2023, 31(4):553-573.
- [ 10 ] 赵云泽, 刘珍. 情绪传播:概念、原理及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思考. *编辑之友*, 2020, 1:51-57.
- [ 11 ] 邓向阳. “信息流行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理. *人民论坛*, 2020, 22:113-115.
- [ 12 ] 王斌. “信息疫情”的理论维度、结构成因与治理反思.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1, 4:38-45.
- [ 13 ] S. Goel, A. Anderson, J. Hofman, et al. The Structural Virality of Online Diffus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62(1):180-196.
- [ 14 ] 熊若柳, 李倩坤. 病毒式传播中受传者的心理因素. *青年记者*, 2016, 5:21-22.
- [ 15 ] S. Vosoughi, D. Roy, S.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2018, 359(6380):1146-1151.
- [ 16 ] J. L. Juul, J. Ugander. Comparing Information Diffusion Mechanisms by Matching on Cascade Siz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 118(46):e2100786118.
- [ 17 ] A. Mian, S. Khan. Coronavirus: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BMC Medicine*, 2020, 18(1):1-2.
- [ 18 ] D. Shah, T. Zaman. Rumors in a Network: Who's the Culprit?.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011, 57(8):5163-5181.
- [ 19 ] L. Zhao, H. Cui, X. Qiu, et al. SIR Rumor Spreading Model in the New Media Age.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3, 392(4):995-1003.
- [ 20 ] Y. Zhou, C. Wu, Q. Zhu, et al. Rumor Source Detection in Networks Based on the SEIR Model. *IEEE Access*, 2019, 7:45240-45258.
- [ 21 ] P. L. Delamater, E. J. Street, T. F. Leslie, et al. Complexity of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_0$ ).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19, 25(1):1.
- [ 22 ] 陈维龙, 王保华. 数字时代“信息疫情”表征、传播形态及治理范式.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6:125-132.
- [ 23 ] 陈华明, 孙艺嘉, 余林星. 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新闻界*, 2023, 5:1-9.
- [ 24 ] A. Krishna, T. L. Thompson. Mis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A Review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Scholarship.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21, 65(2):316-332.
- [ 25 ] 楚亚杰. 人们为何相信不实信息:科学传播视角下的认知偏差与信息鉴别力研究. *新闻大学*, 2020, 11:66-82+127.
- [ 26 ] I. Freiling, N. M. Krause, D. A. Scheufele, et al. Believing and Sharing Misinformation, Fact-checks,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Anxiety During COVID-19. *New Media & Society*, 2023, 25(1):141-162.
- [ 27 ] H. K. Kim, J. Ahn, L. Atkinson, et al. Effects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Information Seeking, Avoidance, and Pro-

- cessing: A Multi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5): 586-615.
- [28] X. Wang, L. Lin, Z. Xuan, et al. Risk Communication on Behavioral Responses During COVID-19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A Rapid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Infection*, 2020, 81(6): 911-922.
- [29] S. Loomba, A. de Figueiredo, S. J. Piatek, et al.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Vacc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Intent in the UK and USA.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1, 5(3): 337-348.
- [30] H. Aghababaeian, L. Hamdanieh, A. Ostadtaghizadeh. Alcohol Intake in an Attempt to Fight COVID-19: A Medical Myth in Iran. *Alcohol*, 2020, 88: 29-32.
- [31] D. Jolley, J. L. Paterson. Pylons Ablaze: Examining the Role of 5G COVID - 19 Conspiracy Beliefs and Support for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0, 59(3): 628-640.
- [32] 陈清. 流行病学. 北京: 北大医出版社, 2013: 4.
- [33] 何勇, 杨映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特征及治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6: 130-135.
- [34] 周煜, 杨洁. 疫情期间的谣言变迁与治理路径. *当代传播*, 2020, 5: 91-94.
- [35] 王四新, 徐菱骏. 疫情期的谣言传播与治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5: 79-83.
- [36] J. Y. Cuan-Baltazar, M. J. Muñoz-Perez, C. Robledo-Vega, et al. Misinformation of COVID-19 on the Internet: Infodemiology Study. *JMIR Public Health and Surveillance*, 2020, 6(2): e18444.
- [37] B. Chen, X. Chen, J. Pan, et al. Dissemination and Refutation of Rumor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Infodemiology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1, 23(2): e22427.
- [38] 匡文波, 武晓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模型及特征研究. *新闻与写作*, 2020, 4: 83-87.
- [39] 艾昕, 马捷, 林英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演化与治理策略研究. *情报科学*, 2020, 7: 22-29.
- [40] A. M. Lilienfeld. *Advances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pidemiology*. *Public Health Reports*, 1980, 95(5): 462.
- [41] 赵仲堂.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
- [42] S. Evanega, M. Lynas, J. Adams, et al.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 Quantifying Sources and Themes in the COVID-19 'Infodemic'. *JMIR Preprints*, 2020, 19(10): 1-13.
- [43] 刘鸣箏, 孔泽鸣. 媒介素养视阈下公众谣言辨别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新闻大学*, 2017, 4: 102-109+151.
- [44] 张洪忠, 沈菲, 李昊等. 疫情接近性对谣言信任度的影响: 新冠疫情中传播渠道的中介效应分析. *新闻界*, 2020, 4: 48-56+5.
- [45] 陈雅赛. 重大突发疫情谣言传播与受众接触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6: 100-111.
- [46] G. Pennycook, Z. Epstein, M. Mosleh,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reducing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J. Argo, T. M. Lowrey, H. J. Schau, et al.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48*. Duluth: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2019: 863-867.
- [47] E. J. Lobato, M. Powell, L. M. Padilla, et al. Factors Predicting Willingness to Share COVID-19 Misinform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566108.
- [48] S. Laato, A. K. M. Islam, M. N. Islam, et al. Why do People Share Misinform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rXiv Preprint arXiv:2004.09600*, 2020.
- [49] 朱冠桦, 蒋国平, 夏玲玲. 社交网络上从众现象对谣言传播影响的研究. *计算机科学*, 2016, 2: 135-139+143.
- [50] M. Cha, C. Cha, K. Singh, et al. Prevalence of Misinformation and Factcheck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35 Countries: Observational Infodemiology Study. *JMIR Human Factors*, 2021, 8(1): e23279.
- [51] A. Shirish, S. C. Srivastava, S. Chandra. Impact of Mobile Connectivity and Freedom on Fake News Propensi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Examin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21, 30(3): 322-341.
- [52] 张玮, 耿燕, 康凌宇. 疫情防控中网络虚假信息传播与治理探究. *新闻与写作*, 2020, 6: 101-103.
- [53] S. Tasnim, M. M. Hossain, H. Mazumder. Impact of Rumors or Misinformat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Social Media. *J. Prev. Med. Public Health*. 2020, 53: 171-174.

- [54] A. Bridgman, E. Merkley, P. J. Loewen, et al.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VID-19 Misperception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ews and Social Medi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2020, 1(3): 1-18.
- [55] 聂静虹, 马梦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治理. *新闻与写作*, 2020, 4: 23-30.
- [56] 胡晓乐, 冯跃东, 夏一雪. 基于 AHP-决策树算法的突发事件虚假信息识别与治理研究. *新媒体研究*, 2022, 7: 8-13+38.
- [57] H. Kim, D. Walker. Leveraging Volunteer Fact Checking to Identify M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in Social Medi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2020, 1(3): 1-10.
- [58] G. Pennycook, J. McPhetres, Y. Zhang, et al. Fight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Scalable Accuracy-nudge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31(7): 770-780.
- [59] 王剑, 王玉翠, 黄梦杰. 社交网络中的虚假信息: 定义、检测及控制. *计算机科学*, 2021, 8: 263-277.
- [60] 邢海晶. 社会治理的考验与回应直面疫情中的公民素质现代化. *人民论坛*, 2020, 15: 29-31.

## Viral Diffusion of Infodemic: Features,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Zhong Zhijin, Zhou Jinj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fodemic mainly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at massive rumors and false information diffuse in online media during epidemics. The diffusion of infodemic shows vir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information content, diffusion process, and effect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the infodemic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how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es, why it becomes popular and how to control and govern it.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adopt scientific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subdivide the susceptible population and combin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information epidemic.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infodemic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what influence it brings to organizations, societies and nations. This line of studies also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diffusion of the infodemic and explore why such difference emerges. In terms of infodemic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and warning, accurate dispelling of rumors and effect evalu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inally, further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investigate the causes, manifestations, impact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epide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infodemic; false information; viral diffusion; governance

---

■ 收稿日期: 2022-07-29

■ 作者单位: 钟智锦,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1440

周金金 (通讯作者),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 刘金波